

# 公共信用供给的内在机制初探

——基于第三配置视角

严清华 程锦晖\*

**摘要:** 公共信用不同于传统的关系信用和市场交易中的契约信用,它是发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通过不完全契约或者隐形契约方式体现的信用关系与信用形式。在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不能有效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情形下,由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习俗惯例等第三种力量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第三配置通过理性自律和理性依从的双核内在机制,能对公共信用的供给发挥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作用。理性自律通过道德约束和对信誉资产的追求主动供给公共信用,理性依从则在第三方监督约束下使公共信用“被供给”。同时,健全的制度安排、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理想的公民社会建设等配套体系能确保第三配置发挥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公共信用 第三配置 理性自律 理性依从

##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二元结构转换和新旧体制转轨为特征的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失范和公共信用缺失等问题的凸现,通常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提出社会失范理论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是在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社会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sup>1</sup>

公共信用(public trustworthiness)是发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信用,是公共生活领域中特定个人或组织,在与作为泛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通过不完全契约或者隐形契约进行交往或交易过程中,获得公众信任,建立公共信誉的意愿、行为和绩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公共信用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竞争到凯恩斯的国家积极干预,从市场配置到政府配置,迄今均未得到完满的解答和有效的解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公地悲剧”或“集体行动困境”的一大世界难题。价格机制并不总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法(巴泽尔,1997),尤其对于公共信用资源的配置来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选择原则必然带来公共信用供给市场的“失灵”。政府既是公共信用最重要的供给主体,又是公共信用市场最直接的调控者,它不仅受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的影响,而且不能保证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调控范围和力度的把握上不出现任何偏差和失误。因而,在公共信用资源配置方式上,无论是依赖市场配置这只“无形之手”,还是选择政府配置这只“有形之手”,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与不足,这就需要“第三只手”即第三配置来发挥其应有的弥补功能与调节作用。

第三配置是指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由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习俗惯例等第三种力量对社会经济资源所进行的配置(严清华、刘穷志,2001)。第三配置内涵丰富,从内容结构上看,它不仅包括处于基础地位的习俗惯例、行为模式等属于操作层面的内容,还包括处于上层领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属于指导思想层面的内容,以及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乡规民约和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组织如志愿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属于中间层面的内容;从动力源泉上看,它不仅包括来自于社会的精神力量,还包括来自于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力量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力量。第三配置是一个新近使用的概念,目前学术界

\* 严清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qhyan@whu.edu.cn 程锦晖,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430072。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三配置与信用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及管理研究”(项目批准号为7077308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sup>1</sup>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28-329页。

与第三配置相关的概念还有很多,如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第三部门、第三种调节方式等。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指的社会软力量或软资源。但是,与非正式制度相比,第三配置还包括了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与内容;与社会资本注重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及其所带来的相应收益有别,第三配置所关注的是第三种力量社会经济配置功能的发挥;第三部门是第三配置的重要力量来源或实施主体,但不是第三配置内容的全部;第三种调节方式的内容最为接近第三配置,但第三种调节方式更注重从管理学角度立论,是一个更注重应用性与操作性的概念。第三配置则是从资源配置视角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所表示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对应于市场配置方式和政府配置方式而言的第三种配置方式,它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去有效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其本质在于其配置功能的形成与发挥,基本特征所体现的是其资源的配置性。因而,它似乎可以说是一个角度更新、立意更高、更具统领性和整合力的学术概念。<sup>1</sup>

公共信用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是信用的一种具体形态,它不同于传统的关系信用和市场交易中的契约信用。关系信用是发生在由亲缘、血缘、地缘等形式体现出的特殊人际联系下的信用形式;契约信用是商业社会中交易当事人以签订正式契约形式体现并由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信用形式;公共信用则是发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面向社会公众形成的信用形式,它既不是单纯指政府信用,也不是金融中的信贷或借贷关系,它更倾向于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信赖度(trustworthiness)。<sup>④</sup>公共信用供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出自供给主体的自愿行为,是供给者自觉履行不完全契约或隐性契约的结果,因而不依靠第三配置内在机制发挥功能与作用是无法保障公共信用的有效供给的。

本文旨在探讨第三配置内在机制如何保障公共信用的供给问题。这里的第三配置内在机制是指依靠第三种力量的内在作用,有效地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机制。从基本的博弈模型出发,本文将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内在机制分为理性自律机制和理性依从机制,探索这一双核内在机制的运行机理及配套系统,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二、第三配置对公共信用的作用:基于文献的简要评论

公共信用严重缺失的危害性引起了学者们对公共信用供给问题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至少在以下两点上达成了共识:第一,社会信任、公共可信赖度等公共领域的信用问题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可信赖性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并且是竞争优势的一个可能的重要来源(Dyer and Chu, 2003)。Zak和Knack(2001)用一般均衡增长模型来分析信任、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主体交易时由于面临道德风险,往往只信任与他曾经交易过的人,因此社会信任水平越低,投资率就越低,经济增长也就越差。Knack和Keefer(1997)的研究发现,在高信任的社会,由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有利于鼓励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促进经济增长。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和Vishny(1997)考察了信任与大型组织的关系,结果表明,信任程度越高,会使得司法效率越高、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越大、公司的经营绩效越高、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充足性越好、通货膨胀率越低,进而经济增长水平也就越高。Putnam(1993)、Norris(2002)、Hall(1999)和Newton(2001)等一批社会学家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公共信任这种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Arrow(1972)、Coleman(1988)、奥斯特罗姆(2000)、Putnam(1993)及Fukuyama和Wolff(1995)都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要素,而社会资本又是社会团结、经济有效率和民主稳定的必要条件。Simmel和Wolff(1950)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之一。第二,市场和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信用的创造和维系提供支持。政府可以在社会信任的创造过程中起积极作用(Herrejos and Criado, 2008),在2004年中国遭遇SARS时期,政府的积极行为提高了公众信赖度,也间接提高了政府效率(王硕等,2006)。而公共信用的缺失也会遭受来自市场的惩罚,社会信任水平低下会使物质资本回报率降低,同时降低预期未来收益(Papagapitos and Riley, 2009)。

但是,公共信用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市场和政府的力量,还有赖于第三种力量。尤其在公共生活领域内,第三配置的力量更具有效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即认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交换活动中会受伦理与道德的约束。<sup>④</sup>诺思(1994)指出,一个社会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习惯等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文化,影

<sup>1</sup> 关于“第三配置”的内涵与基本特征的分析,参见严清华、常庆欣、杜长征,2007:《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刍议》,《经济评论》第5期。

<sup>④</sup>关于“公共信用”的探讨,可参见严清华、刘穷志,2008《信用的公共本质与有效提供》,《管理学家》(学术版)第3期;严清华、胡晓晨,2009《民间组织信用偏好分析》,《管理学家》(学术版)第9期;严清华、朱鹏程,2010《政府对公共信用的最优供给》,《管理学家》(学术版)第7期。

<sup>④</sup>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02页。

响着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变迁过程;他还提出经济增长的三大变量: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sup>1</sup>巴泽尔(1997)指出,人们有时不想借助市场价格而愿意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他将献血与卖血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非市场机制有时会优于市场机制的结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Ostrom)在其经典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通过对世界不同国家“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分析,提出了治理公共事物的非政府非市场治理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第三配置理论。

在国内学者中,厉以宁最先提出“第三种调节”概念<sup>④</sup>,并引起众多学者的积极响应。李洪君(1998)认为伦理道德调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继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后的第三种调节力量,同时他从八个方面探讨了“第三种调节”对经济运作的作用。蒋云根(2000)指出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都不能孤立地发挥调节作用,运用道德力量将有利于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在此基础上,严清华等正式提出了“第三配置”概念,并对其内涵、特征和意义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sup>(四)</sup>陈端计(2007)对中国第三配置的制度变迁进行考察,认为第三配置与国家、市场共同构成资源配置体系,并且第三配置自古有之,“即使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即使在市场作用无处不在的经济活动中,即使在政府调控和法制经济日益体现的情况下,信用道德力量的调节却依然出现在人们的经济交往中……,这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更是一种文明人和文明社会的必需品。”<sup>1/4</sup>林欣(2010)认为,在影响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中,只有政府干预、市场调节与第三配置这三只手在各自的领域内协调补充、相得益彰,才能保证社会经济高效率地运行。吴英杰(2010)通过考察慈善服务的历史演进,论证了第三配置对慈善服务这种准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他认为,由于人们意识到市场在提供私人产品、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导致了第三配置机制的发展。

总之,国内外学者都强调了第三配置对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第三配置对公共生活领域乃至公共产品的作用,但都不曾从第三配置内在机制的深层原因上探讨如何解决公共信用供给的难题。而笔者将从第三配置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治理公共信用缺失、保障公共信用有效供给的问题,试图从深层原因上考察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动因、过程和结果,以期探寻其作用机理。

### 三、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双核内在机制

第三配置对公共信用供给的保障是通过其内在机制发挥功能与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公共信用的供给是公共信用的供给者在没有外在强制力约束的条件下,为履行不完全契约或隐形契约而理性自律与理性依从的结果。因而,理性自律与理性依从就构成了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双核内在机制。

#### (一)公共信用理性自律机制

公共信用理性自律是指公共信用供给主体在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介入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我约束供给公共信用的行为。如果公共信用的供给者是企业,那么,理性自律就是企业为遵守道德规范,追求信誉资产而对公共信用的自觉供给。理性自律的动因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对道德、社会文化的遵守,称之为内因自律。诚信自古就是社会所推崇的优良品德和价值取向,所以将从道德出发的自觉供给公共信用看作其自律的内因是毋庸置疑的。另一种是为主动获得信誉资产而理性选择的自律,称之为外因自律。信誉之所以称为资产,是因为它类似于商誉,可以为企业带来长远收益。

如果将自律与不自律这两种决策选择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从长远利益考虑的理性自律是如何保障公共信用有效供给的。

假设市场处于非饱和状态,且信息是完全的。

(1)第 $t$ 期。假设企业选择自律,其货币收益为 $P_{t0}$ ,因守信而积累的信誉资产为 $T_0$ 。假设企业选择不自律且未被发现,其货币收益为 $P_{t1}$ ( $P_{t1} > P_{t0}$ ,设 $P_{t1} = P_{t0} + c$ ),也获得同样的信誉资产 $T_0$ (因为企业被认为是自律的)。由于资产与收益非同一种性质,不能直接加总,因而表中 $T_0$ 只是表示经评估后能够可靠计量并能与

<sup>1</sup> 道格拉斯·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65页。

<sup>④</sup> 厉以宁,1997《论习惯与道义调节》,《光明日报》6月23日。

<sup>(四)</sup> 严清华等的探讨,除前面提及的文献外,还可参考刘穷志、严清华,2002《第三种管理模式与管理哲学》,《学习与实践》第11期;严清华、刘穷志,2003《市场秩序的诚信维系及其路径依赖偏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严清华、朱华雄,2004《传统诚信理念规范市场秩序的机制和效用探析》,《中州学刊》第4期;严清华等著,2005《路径依赖、管理哲学与第三种调节方式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严清华等著,2006《马克思主义第三配置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sup>1/4</sup> 陈端计,2007《中国第三配置的制度变迁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货币收益加总的结果。

自律	不自律
$P_{i0}$	$P_{i1}$

(2)第  $t+1$  期。假设企业继续选择自律, 其与信誉无关的货币收益为  $P_{i0}$ 。由于上一期积累了  $T_0$  的信誉资产, 给本期带来系数为  $b(b > 0)$  的额外收益  $bT_0$ 。假设企业选择不自律, 且被发现上期失信的概率为  $a(0 < a < 1)$ 。若未被发现, 则仍获得  $P_{i1}$  的货币收益和  $bT_0$  的额外收益; 若被发现, 收益为 0 且信誉资产随之丧失。因此本期不自律的期望收益为  $(1-a)(P_{i1} + bT_0)$ 。

自律	不自律
$P_{i0} + bT_0$	$(1-a)(P_{i1} + bT_0)$

(3)为简化分析, 在此仅将第  $t$  期与第  $t+1$  期的期望收益加总并比较:

$$\begin{aligned} \Delta E &= E_{\text{自}} - E_{\text{不自}} = [P_{i0} + (P_{i0} + bT_0)] - [P_{i1} + (1-a)(P_{i1} + bT_0)] \\ &= 2P_{i0} - 2P_{i1} + aP_{i1} + abT_0 \\ &= aP_{i0} - (2-a)c + abT_0 \end{aligned} \quad (1)$$

如果  $\Delta E > 0$  那么企业理性自律倾向更强。

$\Delta E$  为厂商理性自律行为增加的收益, 只要  $\Delta E > 0$  厂商就有自律供给公共信用理性选择的积极性。并且  $\Delta E$  越大, 厂商供给公共信用的自律倾向越强。接下来考虑影响  $\Delta E$  大小的几个因素:  $a, b, c, T_0$ 。

(1)关于  $a$ 。对 (1) 式中  $a$  求偏导, 得到  $d\Delta E(a)/da = P_{i0} + c + bT_0 > 0$ , 说明  $a$  与  $\Delta E$  正相关, 即被发现失信的概率越大, 厂商越自律。

(2)关于  $b$ 。对 (1) 式中  $b$  求偏导, 得到  $d\Delta E(b)/db = aT_0 > 0$ , 说明  $b$  与  $\Delta E$  正相关, 即信誉资产带来的长期收益越大, 厂商越自律。相反, 信誉资产未能给企业创造额外收益, 那么厂商便没有自律供给公共信用的激励。

(3)关于  $c$ 。对 (1) 式中  $c$  求偏导, 得到  $d\Delta E(c)/dc = a - 2 < 0$ , 说明  $c$  与  $\Delta E$  负相关, 即不自律的额外直接收益越大, 企业越会放弃对信誉资产的追求, 做出不自律的行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旅游区的饭馆通常比普通区的饭馆昂贵得多, 因为他们通常是不需要回头客的“一锤子买卖”。

(4)关于  $T_0$ 。对 (1) 式中  $T_0$  求偏导, 得到  $d\Delta E(T_0)/dT_0 = ab > 0$ , 说明  $T_0$  与  $\Delta E$  正相关, 即企业因自律获得的信誉资产越大, 越有可能在后期以实际直接收益形式为企业带来好处, 越有自律供给公共信用的激励。

无论基于道德的自觉还是基于长远利益的自觉, 都是人们遵守社会秩序、供给公共信用而理性选择自律行为的动因。第三配置通过理性自律机制促使公共信用的供给者从遵守道德和获得维护信誉资产两个方面获得激励并自觉供给公共信用。

除以上理性自律的激励因素外, 其道德修养水平也对其自觉供给公共信用行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企业领袖及员工的道德修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 即便失信的额外收益诱惑很大, 也不会影响其尊重社会、遵守道德规范的理性自律选择。道德观念是第三配置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三配置能够通过道德约束对公共信用的供给起积极作用。

## (二)公共信用理性依从机制

公共信用理性依从是指社团组织和社会维权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对公共信用供给方起到影响和监督作用, 从而使其供给公共信用的行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以组织形式存在的第三配置力量。商会就是一种能够在信用监督和制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维权组织, 其运行机制是一种典型的第三方治理机制。商会可以监督潜在交易者的不诚实行为, 并记录和传递交易者失范的信息, 从而使类似的交易走出“囚徒困境”而实现合作均衡。下面以商会和会员企业为例, 运用监督博弈<sup>1</sup>这一混合博弈模型进行探讨, 说明这种典型的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过程中第三方约束是如何发挥作

<sup>1</sup> 参见张维迎, 2004《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65 页。

用的。

假设商会监督成本为  $C$ , 发现会员企业失信后罚款  $F$ , 会员企业守信的净收益为  $x$ , 失信的净收益为  $y (F > y - x)$ , 通常情况下  $x < y$ , 不然, 一开始会员企业便会自觉守信。

表 3 商会与会员企业的监督博弈

		会员企业	
		守信	失信
商会	监督	$-C, x$	$-C + F, y - F$
	不监督	$0, x$	$0, y$

设  $\theta$  为商会监督的概率,  $\beta$  为会员企业守信的概率。

(1) 给定  $\beta$ , 商会选择监督 ( $\theta = 1$ ) 和不监督 ( $\theta = 0$ )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begin{aligned} \Pi A(1, \beta) &= (-C) \times \beta + (-C + F) \times (1 - \beta) = F - F\beta - C \\ \Pi A(0, \beta) &= 0 \end{aligned}$$

解  $\Pi A(1, \beta) = \Pi A(0, \beta)$ , 得到  $\beta^* = 1 - C/F$ , 即如果会员企业守信的概率大于  $\beta^*$ , 商会的最优选择不监督; 如果会员企业守信的概率小于  $\beta^*$ , 商会的最佳选择是监督; 如果会员企业守信的概率等于  $\beta^*$ , 商会随机地选择监督或不监督。

(2) 给定  $\theta$ , 会员企业选择守信与失信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begin{aligned} \Pi B(\theta, 1) &= x\theta + x(1 - \theta) = x \\ \Pi B(\theta, 0) &= (y - F)\theta + y(1 - \theta) = y - F\theta \end{aligned}$$

解  $\Pi B(\theta, 1) = \Pi B(\theta, 0)$ , 得到  $\theta^* = (y - x)/F$ , 即如果商会监督的概率小于  $\theta^*$ , 会员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失信; 如果商会监督的概率大于  $\theta^*$ , 会员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守信; 如果商会监督的概率等于  $\theta^*$ , 则会员企业随机地选择守信或失信。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theta^* = (y - x)/F$ ,  $\beta^* = 1 - C/F$ , 即商会以  $(y - x)/F$  的概率选择监督, 会员企业以  $1 - C/F$  的概率选择守信。显然, 商会与会员企业的监督博弈的纳什均衡与失信净收益  $y$ 、守信净收益  $x$ 、监督成本  $C$  和罚款  $F$  有关。罚款越重, 会员企业守信的概率就越高; 监督成本越高, 会员企业失信的概率就越大。即表明, 商会的积极运作能够制约会员企业的失信行为。

公共信用供给中的理性自律机制与理性依从机制既非市场配置中的利益约束机制, 也非政府配置中的法令监管机制, 它属于非市场、非政府的第三方机制, 它是第三配置特有的双核内在机制。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双核内在机制对应着非正式制度的两种类型, 一是个人自我约束, 一是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 理性自律通过道德约束和对信誉资产的追求主动供给公共信用, 理性依从则在第三方监督约束下使公共信用“被供给”。

#### 四、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内在机制运行的配套系统

作为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双核内在机制, 理性自律和理性依从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就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紧密契合的配套系统以形成有力支撑。

##### (一) 健全的制度安排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 (诺思, 1994), 制度还构成交易约束条件的外部环境, 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科斯等, 1994)。健全的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甚至促进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内在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一个法律制度比较规范, 法律效率比较高的社会中, 市场交易者在使其收益最大化的同时, 也会尽可能考虑到各种约束条件下失信受惩的风险。因此, 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约束会提高公共信用的供给程度。同时, 灵活、低成本的民间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安排的不足, 进一步改善信用环境。例如, 行业协会就是以自身和行业的发展为目标, 会员共同制定规则并承诺遵守, 由协会 (第三方) 执行监督与仲裁的民间非正式制度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有效方式。

##### (二)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公共信用得以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首先, 它通过征信系统准确地记录政府、知名团体和公众人物的信用状况与相关信息并公布于众; 其次, 它能够揭露社会中公共信用缺失的种种行为, 惩恶扬善, 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文明水平; 再次, 它能在公共信用的供给中增加守信的信誉资产和失信的损

失程度;最后,它能对社会失范行为起到预警作用,约束和限制失信行为。目前,我国“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尤其是对公共信用的监管相当匮乏,各种评价体系还未建立,一定程度上放纵了我国公共信用缺失问题的蔓延。

### (三)理想的公民社会建设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源于西方并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将公民社会定义为“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公民社会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公共生活领域内,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社团组织之中。在公民社会中,公民自由结合,使得本是私人的个体形成公众,以群体的力量解决公共利益问题(哈贝马斯,1999)。公民社会能对国家权力起到制衡作用,尤其对权威政府的无效干预或过度干预,对失信于民的政府公信力破坏行为,更能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我国直到经济转型期才引进公民社会理念。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救援等一系列行动中,普通百姓、社会团体和公众人物的热情捐助与无私奉献,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热忱和意识与日俱增,不少学者据此断言“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但更多学者则认为中国进入公民社会的理想状态“任重而道远”。公民社会建设一旦进入理想状态,那么,公民社会与市场 and 政府就能形成彼此信赖、相互促进的格局,公共信用就会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系统下得到有效的供给。

##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从经济转型期公共信用缺失这一现象出发,解释了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失效情形下第三配置对保障公共信用供给所发挥的弥补功能与调节作用。通过双核内在机制原理分析表明,当失信被发现概率增加、交易次数增多、失信收益降低或信誉资产的获得及带来未来收益加大时,就能够激励公共信用供给方理性自律,自觉供给公共信用;当商会监督成本降低,对会员企业失信行为惩罚加重时,就能够激励会员企业对守信的理性遵从。同时,良好的道德素质能直接影响公共信用供给方的自律行为。此外,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作用发挥还需要正式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及公民社会建设的有力配合。

基于以上分析,为有效发挥第三配置保障公共信用供给的功能与作用,笔者建议采用如下对策措施:

第一,通过教育宣传、文化熏陶树立诚信的道德意识,形成追求公共信用的文化信仰。巴尼和汉森(Bamey and Hansen, 1994)指出,在长期的演化中,稳定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内化在组织、制度和 文化之中,最终通过影响个人的行为而形成一种社会普遍的信用价值观和信用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发掘传统文化习俗中的公共信用元素,广泛倡导诚信观念,形成遵信守约的自律意识与社会共识。同时,发挥道德的力量——舆论来约束失范行为。这就要求网络与媒体保持权威自律、树立公信力,然后充分发挥强大的信息与舆论功能,监督公共信用的供给。在“周老虎”事件中,正是由于网民坚持质疑虎照真伪而且要求鉴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重重压力下,虎照作假的真相终于被揭示出来。网络使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增大,增加了公共信用供给者的失信成本。媒体在公共信用治理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

第二,充分发展社团组织和社会维权组织等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信用监管体系。社会共同体和社会网络结构内部的互动和沟通,能对公共信用供给方起到影响和监督作用,使其恪守公共信用准则。据韦伯在100年前的观察,参加组织等于获得一个社会印章(social seal),得到一个信誉认证。如果某人干了坏事,外人也许无法追踪这个具体的人,但他们很容易识别此人所属的团体,从而对其团体实施惩罚,这样组织成员个人的不当行为就会损害社团整体的信用,从而损害每个社团成员的个人利益,社团组织就有必要对行为不轨者实施内部惩罚。同时,从均衡论视角看,社会博弈的结果,必然要求社会形成信用弱势群体集体力量对强势地位主体的制约。这样,社会弱势方才能聚集个体的力量,以组织的形式改善其地位,维护其利益。

第三,发挥多中心自我管理的重要作用。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反对政府权力的垄断和扩张,强调自我管理。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同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各方的行为不仅取决于自我决策偏好,而且也依赖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在多中心的社群及相关单位里,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打交道,能够有效表达意愿,参与公共事物的治理。单独的个人被凝聚成为公众性的社群,公共意见与公共理性能自发产生,他们知道群体里谁是能够信任的,从而为公共信用的建设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源与 社会资本。相反,如果没有多中心的公众治理,政府权力失去了社会制约便会无限度扩张,公共意见和公共理性也就无从产生,公共信用也随之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公共信用的有效供给更无从谈起。因而,发挥多中心治理的作用是解决公共信用供给难题的重要途径。

## 参考文献:

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第 12- 325 页。
2. 巴泽尔, 1997《产权的经济分析》,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139 页。
3. 陈端计, 2007《中国第三配置的制度变迁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 1 期。
4. 陈孝兵, 2005《信用、权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评论》第 4 期。
5. 道格拉斯·诺思, 199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3 页。
6. 哈贝马斯, 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译本, 上海学林出版社, 第 14- 170 页。
7. 蒋云根, 2000《重视“第三种力量”: 道德力量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实事求是》第 5 期。
8. 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著, 1994《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105 页。
9. 李洪君, 1998《经济运作中的第三种调节》, 《北方论丛》第 3 期。
10. 厉以宁, 1997《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 《哲学研究》第 6 期。
11. 厉以宁, 1997《论习惯与道义调节》, 《光明日报》6 月 23 日。
12. 林欣, 2010《第三配置视角下我国慈善经济失效的现状分析》,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13. 涂尔干, 2000《社会分工论》, 中译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 328- 329 页。
14. 王颖等, 2006《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SARS 认知情况的调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 6 期。
15. 吴英杰, 2010《慈善服务供给: 第三配置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求索》第 1 期。
16. 张维迎, 2004《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65 页。
17. 章也微, 2001《浅析公共信用的若干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18. Arrow, Kenneth J. 1972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 343- 362
19. Bamey, Jay B., and Mark H. Hansen 1994 “Trustworthiness as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Special Issue: Compet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Winter 1994): 175- 190
20.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 S95- S120
21. Dyer, Jeffrey H., and Wujin Chu. 2003. “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Organization Science*, 14(1) (Jan - Feb): 57- 68
22. Fukuyama Francis. 1995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lob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74(5): 89- 103
23. Hall Peter A. 1999.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3): 417- 461
24. Hereros Francisca and Hénar Criado. 2008 “Th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ru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9(1): 53- 71
25. Knack S., and P. Keefer.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251- 1288
26.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7.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 333- 338
27. Newton, Kenneth. 2001.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2): 201- 214
28. Norri Poppa.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Papagapitos Agapitos and Robert Riley. 2009 “Social Trust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Economics Letters* 102(3): 158- 160
30. Putnam, Robert D.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35- 42
31. Seligman, Adam B. 1998 “Trust and Sociability: On the Limits of Confidence and Role Expect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7(4): 391- 404
32. Simmel G., and K. H. Wolff.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33. Zak Paul J., and Stephen Knack. 2001.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0): 295- 321.

## The Primary Investigation on Internal Mechanism of Public Trustworthiness Supplying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Third Allocation

Yan Qinghua and Cheng Jin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Public trustworthiness, unlik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credit or contract credit in the market transactions, is a credit relationship and form happened in the areas of public life and embodied through incomplete contract or stealthy credit.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wh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allocation can not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upply of public trustworthiness, third allocation, functions through the third power besides market and government such as ideology, ethics and customary practices, can play a more direct and effective role to supply the public trustworthiness through the internal mechanism composed of rational self-discipline and rational compliance. Rational self-discipline can supply public trustworthiness forwardly by moral restriction and going after credit assets, and rational compliance can make it “be suppli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third party. At the same time, support system consist of sou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omprehensiv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ideal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can play a role in effectively ensuring the role of third allocation.

**Key Words** Public Trustworthiness; Third Allocation; Rational Self-discipline; Rational Compliance

**JEL Classification** B5 H4 P2

(责任编辑: 彭爽)